

经济学演进中的“综合”与“折中”

黄海天 尹伯成

〔摘要〕 经济学演进总是通过经济学家们在理论上的不懈创新实现的，而以往常被我国学术界斥之为“大杂烩”的“综合”、“折中”，正是这种创新的手法之一。阿·马歇尔通过对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的“综合”、“折中”建立的均衡价格论，保罗·萨缪尔森通过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综合”、“折中”建立的现代混合经济管理理论基础——“新古典综合”理论，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在对立、分歧中的相互“综合”与“利用”都是例证。不仅西方经济学演进中不同流派可以“综合”、“折中”，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并非水火不相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固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但必须结合国情，科学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提高合理配置资源和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并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必须在不断吸取西方经济理论的营养过程中才会随时代而发展，显示其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 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新古典综合”；凯恩斯理论；新古典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折中

〔中图分类号〕 F0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09) 02-0065-05

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时代的前进，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永远是经济学不断演进的源泉和基础，而这种演进是通过经济学家们在理论上不懈创新实现的。在这种创新中，综合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理论，甚至将看似对立的理论加以折中，也是常见的手法。但以往我国学术界对此常有偏见，将这种“综合”尤其是“折中”斥之为大杂烩。本文以阿·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1915—）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为例说明“综合”与“折中”在经济学演进中的作用与意义。

一、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 和生产费用论的“综合”与“折中”

在经济学说史上，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重心和立足点开始由古典经济学时代的生产成本分析转向边际效用分析轨道。

难道生产成本分析真的没有用了吗？任何商品生产出来，明明都要花费成本，怎么生产成本分析在边际革命以后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呢？在经济分析中如何协调传统的生产成本理论和新流行的边际效用理论之间的矛盾，阿·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的创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 黄海天，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上海 200444；

尹伯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所谓生产论和边际效用论之间的矛盾，乃指商品价值或价格究竟是由生产成本决定，还是由边际效用决定这两种理论间的矛盾。传统古典经济学派认为由生产成本决定，而边际效用学派认为由商品边际效用决定，阿·马歇尔则提出，这两种理论都有道理，只是边际效用决定的是商品的需求价格，而生产成本决定的是商品的供给价格。马歇尔认为，商品的需求价格衡量了商品对购买者的边际效用，^[1]而“生产费用就是商品的供给价格”，^[2]“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的产量是均衡产量，“它的售价可以叫做均衡价格”。^[3]就这样，均衡价格论巧妙地解决了古典的生产费用论和当时流行的边际效用论在解释商品价值或价格中的矛盾问题。应当认为，这种均衡价格论在经济学演进史上是一大理论创新。

然而，过去我国的一些经济学说史著作常把马歇尔这种均衡价格论说成是一种折中主义大杂烩，因为它只是把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论加以调和折中，再加上一个经济学说史上早就存在的供求论而已，根本没有自己在理论上的创新。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第一，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并非经济学说史上简单的供求论。他没有停留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上，而是进一步寻找形成需求和供给背后的因素是什么。他认为，购买者愿付一定价格来买商品是为了取得商品的效用，即需求取决于效用。要人们为购买的商品付价越高，所买每单位商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必须越大，而边际效用只有在商品数量越少时才会越大，这样，才有了商品价格和购买量成反向变化的需求规律。同样，他用商品生产费用论说明为什么生产者（出售者或供给者）供给量越大则售价（供给价格）必须越高的供给规律。正是这种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在价格理论形成中的运用，划清了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历史上的简单供求论的界限。

第二，将前人理论综合运用、加以改进而成的新的理论成果，绝非既往理论的简单拼合，犹如餐桌上的大拼盘。大拼盘里的各味菜肴仍是各味菜肴，不管是装在拼盘里还是单独装在冷盘里。然而，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绝非餐桌上这类拼盘。诚然，马歇尔的整个理论体系确实是前人思想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并不是各种不同经济学观点的简单凑合，而是融会贯通、加工改造组装而成的一套新的经济理论体系，犹如人们使用砖、木料、水泥、钢筋等建造了一座大厦，就再不能说大厦还是砖、木料等等。同样，拿边际效用论和生产

费用论综合而成的均衡价格论来说，本来，只用生产费用说明价值，或只用边际效用说明价值，都是片面的，难以对价值和价格作出完美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但经马歇尔加工改造后，以生产费用说明供给价格，以边际效用说明需求价格，再加进均衡的时间因素，勾画出从短期市场价值到长期正常价值的发展图景，使得本来难以弄清的价值形成过程得到了清楚的说明，也符合人们日常的感觉和理性认识。

第三，剪刀式理论并非供给和需求在价值决定上的半斤八两论。马歇尔的确说过：“我们讨论价值是由效用所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和讨论一块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是剪刀的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的确，当剪刀的一边拿着不动时，纸的裁剪是通过另一边的移动来实现的，我们大致可以说，纸是由第二边裁剪的。”^[4]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认为在价值决定上供给和需求是半斤八两，一样重要。相反他认为，只是在短期内，需求才在市场价值形成时更起作用，而在长期内，商品正常价值形成时，供给起决定作用，而正常价值才是商品价值的基础。因此，他认为，在价值形成中起根本的决定性作用的是供给因素，是生产费用，也正因为如此，马歇尔被认为是古典路线的继承者，他只是用边际效用论的新思想来充实和完善古典价值论而已，因此他的学说才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二、“新古典综合”：凯恩斯理论和 新古典理论的“综合”与“折中”

尽管阿·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是比约·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思想、观点和内容上要深刻得多的又一次综合折中，因为他把两种完全对立的价值论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种均衡价格论。然而，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所阐明的，毕竟还只是经济资源如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实现优化配置，它献给人们的也只是是一支自由竞争的赞歌，而相互竞争的也只是私人生产经营企业。可是，现代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越来越显示出经济学的任务不仅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还要解决资源能否充分利用问题；不仅要说明市场的经济功能，还要能说明政府的经济功能。于是，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了。凯恩斯经济学从理论、方法到政策思想各方面都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实现了一场革命。然而，有了这场革命，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否寿终正寝，或者说该被彻底抛弃、彻底否定了呢？

对此，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革命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经济学。凯恩斯本人认为，当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还是对的。^[5]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只是从不同角度说明统一的现代市场经济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既需要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发挥调控和管理经济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凯恩斯经济学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但可以结合，而且应当结合。于是，萨缪尔森等人把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加以综合折中，构筑了一套新的从微观到宏观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新古典综合”，即经济学说史上第三次综合折中。这一次综合，完成了经济学既说明资源配置又说明资源利用的全新使命，构筑了一套有机的统一说明现代混合经济体制的完整理论框架。

应当认为，“新古典综合”从基本倾向看还属于凯恩斯主义，它不但过去曾受到新剑桥学派的挑战，现在还继续受到新自由主义和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派的挑战。也可能正是在这种不断接受挑战的过程中，它不断地“综合”进现代各种不同的新理论而使自己获得丰富、完善和发展。现在，萨缪尔森等人似乎还摆出这样一种架势：他们的理论，不仅会综合新古典传统理论，还能综合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他们认为值得吸收的有价值的东西。正如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出版50周年所写的“金色的诞辰”一文中所说的：“由于全面而精心地处理了主流经济学中的不同派别，这本著作得以保持了它在经济学参考书目中的代表作位置。”^[6]当然，不能认为这本畅销的经济学教材所讲的东西全部就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主张，但“新古典综合”也确实在不断吸收当代经济学发展中的最新成果。这样的“折中”“综合”，并非餐桌上的简单拼盘，更不是什么大杂烩。正确的“折中”本身就是一门艺术；科学的“综合”更是一种创造，是融会贯通，是推陈出新。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不断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不断发展起来的。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 对立和分歧中的相互“综合”与“利用”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从其基本倾向来看，仍属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潮，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采用，加上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一定时期内

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而只是在一段时期内缓和了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矛盾的积累，经济危机又以新的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这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滞胀”的困境中明显地暴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式各样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东山再起，其中，理论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由现代货币主义发展而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完全主张经济自由，在经济理论上更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它的三个关键性假设是：经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从上述假定前提出发，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尤其是新古典综合派发起了猛烈攻击，并试图从传统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出发建立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大厦。其基本点包括：①以AS-AD模型取代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②结合“自然率”假说论证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失业和通胀之间的替换关系不仅在长期不存在，在短期也不存在；③强调政策制定应优先考虑规则而非相机抉择。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假设和要点，看起来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彻底决裂和根本否定，然而，这种决裂和否定中同样包含着对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概念、观点和内容的“综合”。例如，以AS-AD模型取代IS-LM模型而言，不仅AD曲线本身就从IS-LM模型而来，而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AS曲线之所以成为垂直线，乃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资源不是闲置而是严重不足。如果短期内资源存在闲置，总供给仍具弹性，通过扩大总需求仍可增加产出与就业，这不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融合吗？再以失业和通胀是否存在替代关系而言，假如没有新古典综合派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哪来弗里德曼的短期、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失业与通胀在短期和长期都不存在之说。可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尽管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根本背离，但不能认为这种新学说和以往的或现行的凯恩斯主义毫不相干。

以现代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前提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很难存在的，例如，经济当事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人，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信息获取都是有成本的，因而很难做到理性预期，商品价格都能按供求关系灵活调整也不现实，市场并非连

续出清。这样，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思想除了政府有必要使他们的政策取信于公众以免多变而失信于民外，总体而言，实践意义并不很大。正因为此，当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无法通过完全经济自由摆脱经济困境时，以萨缪尔森等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卷土重来。但这一回不是简单重来，而是重视吸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包括重视供给分析，重视打造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这后面一点是一批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如乔沾·阿克洛夫等人致力之所在。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也是凯恩斯主义，也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缺陷，由此形成的经济波动和失业问题仅靠市场自发调节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靠国家干预即政策调节。然而，这种新凯恩斯主义之所以戴上“新”的帽子，是因为它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有区别或者说“差异”：它吸取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一些成果，主要是承认经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和理性预期原则是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但他们不同意市场可随时出清的假定，而坚持市场的非出清假设，即市场出现供求不平衡后，工资和价格都不能立即作出迅速变化以达到供求平衡，就是说，经济将持续出现非均衡。工资和价格为什么不能立即作出市场所要求的调整，新凯恩斯主义者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的经济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和理性预期假设为工具作出解释，认为工资和价格刚性起因于经济行为主体都是理性人。

四、从国情出发运用西方经济理论

以上我们讨论了经济学发展中经济学家如何“综合”与“折中”别人的不同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以上的例子说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对既有理论的“综合”甚至不同观点的“折中”是很有关系的，甚至可以说，综合折中是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方法之一。且不说综合，为什么有时“折中”也能成为经济学创新方法之一？这是因为，所“折中”的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可能实际上是从两种不同角度研究问题得出的结论，而这些结论、观点恰恰包含了相对的、但是片面的真理性，如将它们妥善“折中”，就可能得出较完善的新理论。

从对旧理论的综合折中中产生的新理论，是否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

的利用和借鉴？一些同志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以从已有的资产阶级理论中折中综合出自己的新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法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综合折中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为它们各自代表完全对立的两大阶级的利益，两个阶级的经济学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因为如此，至今国内还有不少经济学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强调的是分析批判，而轻视对其吸收和借鉴。

这种观点和态度其实并不可取。诚然，西方经济学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我认为，这并不妨碍对所谓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综合利用和借鉴吸收。为什么呢？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两种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为资本利益辩护，决定了它不可能承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将来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历史过渡性。然而，所有这些并不会妨碍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综合利用和借鉴。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理论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理论，另一方面又是现代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理论，而且这种两重性是共生共灭的，犹如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一样。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是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经济而发财致富的。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也是在不断发展商品生产的形式中实现的。为了发财致富，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需要不断地总结如何在生产经营中提高经济效益，如何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如何防止和克服经济大起大落的波动，如何发展对外贸易等，这样，一套套经济理论就在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中产生出来，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我们实行的又是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要讲经济效益，都要讲资源配置，都要讲公平竞争，都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因为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向人家学习；不能因为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吸取和综合西方经济理论中大量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随着我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必须越来越多地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和它们开展竞争，这样，它们的经验，它们的理论，

应当越来越受到重视。对我国来说，闭关锁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计划经济老一套也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再不更新，再不与与时俱进，就会吃大亏。正因为如此，当前我们一方面说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要批判；另一方面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恰恰又是大量使用西方经济理论。可见，今天我们已根本用不着讨论该不该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而是应考虑如何根据国情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由于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不少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借鉴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就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绝对不可照搬照套，至少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具备。市场机制在我国运行的作用程度和范围就要受到限制，一些西方经济理论对我国当前情况的适用性就要打折扣。

2. 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但中国目前处于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而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

3. 我国是 13 亿人口的大国，人口压力对我们应用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很大的约束。在人口较少的国家，个体经济行为轻微变动的集合效应可能不甚显著，而在我国则可能形成巨大的冲击。例如，单个企业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裁汰冗余员工，有利于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但全国所有企业同时如此行动，便会出现规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造成失业率明显上升，而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又不完善，结果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人口压力会限制市场机制的运行，不顾这一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具体结论就会碰钉子。

4. 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也是我国要考虑的国情之一。例如，西方有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而我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解放后长期的计划模式，许多传统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影响远未涤除。在这样情况下一味推行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效率原则必然受到阻碍。

5. 根本制度差异以及大家熟知的城乡差别、东中西部地区差别等因素，都决定了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也只能从国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和应用其基本原理。

但是，强调国情不同，绝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错了，也不意味着今天不适用的东西明天也一律不适用。不适用是由于条件不具备，条件具备了就可能适用。中国的改革总在前进，渐进式地稳步前进，条件在逐步具备。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随着时代而发展，充分显示其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也离不开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综合运用。

〔参考文献〕

-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 商务印书馆，1981. 114.
- 〔2〕 〔3〕 〔4〕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M〕. 商务印书馆，1981. 31, 37, 40.
- 〔5〕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商务印书馆，1977. 322.
- 〔6〕 萨缪尔森·经济学〔M〕. 萧琛主译，华夏出版社，1999. 4.

(责任编辑：张 琦)